

“三星堆与世界上古文明暨纪念三星堆祭祀坑发现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雷雨 冉宏林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摘要：2016年7月18日至19日，“三星堆与世界上古文明暨纪念三星堆祭祀坑发现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广汉市三星堆博物馆召开，约150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学术发言涉及分期断代研究、聚落考古研究、科技考古研究、重要遗存研究和文化交流研究等多方面，为三星堆遗址今后的考古工作和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线索。

关键词：三星堆祭祀坑；年代序列；聚落考古；经济形态；环境考古；文化交流

1986年7月18日，三星堆祭祀坑在砖厂工人的锄头下面世，^[1]由此带来了三星堆遗址30年的荣光，遗址的考古工作和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2016年7月18日至19日，距离发现三星堆祭祀坑整整30年后，由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和中国殷商文化学会联合主办的“三星堆与世界上古文明暨纪念三星堆祭祀坑发现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三星堆博物馆隆重召开，^[2]来自美国哈佛大学、英国牛津大学、阿根廷拉普拉塔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三星堆博物馆等40余家单位的约150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会议在中国第一部文创动漫故事片《神树的传说》的首映中开幕，该片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共同策划编制，从形式设计到内容阐释均做到了学术性、趣味性和观赏性的完美融合，受到与会学者一致好评。

两天的学术讨论紧张而激烈，各种观点层

出不穷、精彩纷呈，总结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年代序列的完善与调整以及文化性质的再研究

尽管关于三星堆遗址的分期仍旧有“三期说”^[3]和“四期说”^[4]的分歧，但其从新石器时代晚期经夏、商、西周延续至东周时期的年代序列已基本确定，不会有太大的变动。不过，随着新的考古资料的不断出现，三星堆遗址的年代序列仍有完善与调整的必要性。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雷雨副研究员长期工作于三星堆遗址，主持并参与了历次考古发掘，在他题为《三十而立——三星堆考古30年回顾》的报告中，他将1999年和2000年在月亮湾地点发掘所获部分材料归为二期最早段，填补了一、二期之间原有的缺环，而2005年在青关山地点发掘的以H62为代表的遗存则被他视为四期最晚段遗存甚至第五期遗存，将遗址的年代下限延长。雷雨之前的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陈德安研究员也在他的发言中将他以往关于三星堆遗址的分期与年代观点作了调整，其中第一期为新石器时代末期至二里头早期，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2800至前1600年

左右,第二期相当于二里头遗址晚期至二里岗(含白家庄)期,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1600至前1300年左右,第三期相当于殷墟早期,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1300至前1150年左右,第四期相当于殷墟晚期至西周早期,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1150至前950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冉宏林重点对原归为第四期的遗存进行了细分,根据陶器类别、形制、纹饰等方面的变化分为两期,前者为第四期,后者为第五期,二者的显著区别是前者罕见或不见尖底器,后者尖底器较多。上述三位学者的研究,很大程度上进一步完善和调整了三星堆遗址的年代序列。不过还应看到,无论是“三期说”、“四期说”还是最新的“五期说”都还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三期说”将每期对应于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导致各期的延续时间长短差异较大,“期”的概念实际上与考古学文化的概念基本等同了。“四期说”和“五期说”则难以回避各期差异性不同的问题,即二、三期之间的差异较一、二期之间以及三、四期(和五期)之间的差异明显要小。此外,从已有的测年数据来看,三星堆遗址每期延续均超过500年,很显然有进一步细化的必要,重新对遗址进行系统测年也是势在必行。

关于三星堆遗址所属考古学文化的争议历来主要集中在一首一尾两方面,中间属于三星堆文化没有异议。三星堆一期遗存有属于宝墩文化和三星堆一期文化的争论,^[5]四期遗存(按:包括最新的第五期遗存在内)则有属于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的争论。^[6]造成这种现象的很大一个原因即是材料发现和发表较少。雷雨副研究员在此次会议上报告了三星堆遗址近几年来新发现的一批一期遗存和四期遗存,包括一期大型建筑、夯土台、器物坑和四期补筑城墙、金器和绿松石器等,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对一期、四期遗存的相关研究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冉宏林即在此基础上将三星堆遗址第四期遗存分为两部分,前者属三星堆文化,后者属十二桥文化。虽然考古学文化与族群不能一一对应,考古学文化的内涵变化、范围变动也与政权的兴衰、政治中心的迁移没有必然的联系,但依

旧具有指示性意义。三星堆一期遗存属于宝墩文化抑或是三星堆一期文化,又或者二者属于同一种考古学文化的两种类型,关系到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晚期,也就是成都平原进入文明社会之前的社会面貌、族群构成等深层次问题,四期遗存所属考古学文化及其变迁则是古蜀国政治中心由三星堆遗址转移到成都地区在文化面貌上的反映,事实上冉宏林也正是由四期所属考古学文化出发论证了古蜀国都城从三星堆遗址转移到金沙遗址的时间应比以往所认为的要晚。

二 聚落结构及其变迁研究

聚落考古在发现三星堆祭祀坑的1980年代引入并流行于中国考古界,^[7]之后30年里,尤其是在“十二五”期间,三星堆遗址在聚落考古理念的指引下取得了显著成果。通过雷雨副研究员的汇报,三星堆遗址不仅确认了“北城墙”,还发现了月亮湾和仓包包两座小城,并且在月亮湾小城内发现了青关山人工土台和大型红烧土建筑,^[8]加上“十二五”以前即已发现的三星堆祭祀坑、仓包包祭祀坑、^[9]仁胜村墓地、^[10]西泉坎台地、月亮湾台地和各段城墙,^[11]三星堆城址尤其是城址北部的布局、演变和营建过程得以逐渐明晰;除此之外在三星堆遗址上游鸭子河流域开展的考古调查,^[12]以及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刘章泽副研究员报告的什邡市箭台村遗址所见的较为丰富的三星堆遗址一至四期遗存,^[13]也使得三星堆遗址所在区域的聚落形态得到初步了解。在上述发现的基础上,少数学者在本次会议上报告了他们对于三星堆遗址聚落结构的新认识,陈德安研究员认为月亮湾城墙为宫城城墙,“北城墙”年代与月亮湾城墙相当,晚于已发现的郭城墙,应属宫城北墙而非郭城北墙,西泉坎台地应属城内一部分,而不应归于城外。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孙华教授与他的观点大致相当,他同样认为现在的北城墙不是大城北城墙,只是宫城北墙,进而将城址复原为类似“回”形,城址的主出口应朝向东南方。

就三星堆遗址的聚落考古研究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聚落内部的结构及其变动;其二是



三星堆遗址所在区域的聚落形态。上文所列举的发现和研究表明均得益于城墙和典型遗迹的确认和发掘，城墙作为线性遗迹是划分聚落结构的天然线索，典型遗迹则是确定聚落各区域性质的直接材料。因此，将来需要进一步了解三星堆遗址剩余各段城墙的年代和性质，并初步理清壕沟、河流的分布、年代和性质，因为它们与城墙一样可以用于划分聚落结构。之后需要在聚落各区域中寻找可以判断该区域性质的典型遗迹，诸如大型建筑、手工业作坊、祭祀坑等。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高寒在本次会议上所作的《墓葬视角的陶寺社会》，从陶寺遗址墓葬出发探讨陶寺遗址各时期聚落、人群、社会等方面的变动。可见，寻找三星堆遗址同时期墓地，尤其是包括王陵在内的大型贵族墓葬区实属亟待之需。“十二五”期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已经开始了对遗址上游鸭子河流域的考古调查，并对其中典型遗址——新药铺遗址进行了发掘，未来需要继续对剩下的区域开展详细调查，并择典型遗址进行发掘，以期对三星堆遗址所在区域的聚落形态有较为完整和细致的认识。

三 经济形态与环境考古研究

所谓经济形态，主要包含三个层次：（1）对象，即农作物、手工业产品本身的各方面情况；（2）技术，即获取对象的过程，包括农作物的种植技术、收割方式、灌溉技术以及手工业产品的制作技术、流程等，农业工具和手工业工具的制作技术也包含在内；（3）主体，即从事农业、手工业的人的相关情况，包括组织管理方式、人群构成、产品分配和使用形式等。以往三星堆遗址在这方面开展的工作较少，在本次会议上也有较为直观的体现，与之相关的除了雷雨副研究员介绍的三星堆遗址近几年开展的植物浮选工作外，仅有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余健对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青铜罍 K2 : 205 的铸造工艺进行了初步探讨，他认为 K2 : 205 青铜罍的盖钮和鸟饰采用铸铆式后铸成形，因圈足壁厚较小，为便于设浇道而在浇道处实施了加厚处理，可视为南方青铜工艺的一个特色。中国社会科学

院考古研究所何毓灵研究员介绍的安阳洹北商城 2014~2016 年考古发掘收获，则在发掘手工业遗存的理念、方法与技术方面为三星堆遗址提供了重要的参考。目前三星堆遗址尚未发现明确的农田和手工业作坊，今后需要寻找这方面的线索，在了解其他遗址相关发掘工作和研究的基础上，针对三星堆遗址的具体情况设计专门的发掘方法，尽可能完整、系列地提取资料，利用科技考古手段进行进一步发掘和研究。

环境考古研究同样是三星堆遗址以往工作和研究所欠缺的方面。在本次会议中，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 Jade D'Alpoim Guedes (玳玉) 教授对青藏高原史前时期农业与气候之间关系的探讨、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林圭桢教授利用陶片切片显微结构探讨宝墩文化时期陶器制作传统和聚落形态的改变与环境变化之间的关系，以及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左志强副研究员关于成都平原宝墩时期城址出现及分化与环境、农业之间关系的讨论，分别从植物考古、科技考古和聚落考古的角度探讨了环境与生产模式、手工业技术和聚落的关系。具体到三星堆遗址而言，环境考古的内容应包括古地貌、动植物构成及变动、河流改道等三方面。古地貌关系着三星堆遗址的选址、聚落结构乃至祭祀行为等重要学术问题，动植物构成及变动是研究三星堆遗址经济形态的主要内容之一，河流改道是研究三星堆聚落结构及其变迁不可避免的重要方面。上述三个方面的研究离不开基础的考古勘探、发掘和相应的科技提取和分析手段，这也将是三星堆遗址今后工作需要重点开展的工作之一。

四 重要遗存研究

一件器物、一种遗迹，由于自身具有的方方面面的信息，加之其所在的背景信息，往往成为学者研究更大问题的钥匙，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单就本次会议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年代研究。香港中文大学邓聪教授从二里头、三星堆、金沙等遗址出土牙璋的扉牙、纹饰对比出发，探讨二里头牙璋在南中国的流布。^[14]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郭明馆员从测绘

数据、文献记载、层位关系、包含遗物、筑造技术等方面出发，将成都羊子山土台复原为五级台阶，并认为其始建年代和废弃年代分别为金沙时期和战国晚期。

其二，特殊现象和特殊行为研究。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朱扬明博士综合考察了三星堆祭祀坑出土与鸟相关的器物，结合同时期其他地区的类似器物，探讨商周时期的鸟崇拜现象。湖南省文化厅熊建华揭示了湖南省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和玉器共出”现象。陕西师范大学曹玮教授在详细梳理晚商时期国内各地区出土祭祀用铜器的特征、组合的基础上，认为三星堆祭祀坑出土器物所反映的祭祀思想和方式与殷墟有明显不同，前者虽受后者影响，但却在祭祀模式和祭祀程式上表现出极大的差别。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赵殿增研究员则通过三星堆祭台（按：即现存的“三星堆城墙”三个土堆）、青关山大型建筑和三星堆祭祀坑探讨了三星堆遗址“台”、“殿”、“坑”三位一体的祭祀仪式。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万娇副研究员通过祭祀坑多件铜器的对比，认为祭祀坑出土器物均来自同一个祭祀场所，祭祀坑本身与祭祀活动并无关系。

其三，技术研究。美国明尼阿波利斯研究所柳扬博士通过研究晚商时期青铜鸮尊，认为长江流域的动物形青铜容器具有造型写实、风格简洁的特征。

其四，社会问题研究。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黄凤春研究员通过对比新出曾国青铜鬲和彭县竹瓦街出土青铜鬲的形制、纹饰等方面，认为二者应源自同一产地，并推测它们均被周王室控制，很有可能是在洛阳成周的铸铜作坊中铸造。

其五，综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朱乃诚研究员对妇好墓随葬的有领玉璧进行了形制分类，进而分析各自的年代和文化因素来源，并推测有领玉璧的用途或可能类似于“护腕”一类防卫工具。

其六，其他研究。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陈显丹研究员认为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部分器物上的特殊纹饰应即早期蜀文明的“图语”或“文字符

号”，系晚期巴蜀符号的前身。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许杰博士通过祭祀坑出土青铜器的细部特征观察讨论三星堆文明研究的问题与方法。

上述研究，或是全新的思路、视角，或是旧瓶装新酒，总是能够带来新的启示。三星堆遗址出土了大量特殊遗物、遗迹，如月亮湾台地的陶瓦、陶水管、青关山台地的陶板状器、青关山城墙下的器物坑、几乎每段城墙下的小型墓葬，当然还有祭祀坑中出土的各类器物，它们或指示着所在区域的功能、性质，或属于某些特殊行为的产物，或记录着三星堆遗址与其他地区的文化交流，或承载着一个不见于文献记载的时代。如果上文三个方面的工作和研究是针对全局，那遗物、遗迹的研究则是对处于全局中的某一点所作的具体探讨，对于全方位了解、认识三星堆遗址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五 文化交流研究

任何一个遗址都不会孤立存在和发展，即便位于四川盆地内的三星堆遗址也不会例外，关于三星堆遗址和同时期其他区域文化交流的研究已经有较多成果，在此不便一一列举。本次会议在这方面同样成果丰富。概括而言，主要可分为以下几类：

其一，与北方的文化交流。一直以来，三星堆遗址及其代表的古蜀文明被视为早期中国“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非独立的文明，原因即在于三星堆遗址至始至终都与北方中原地区有着密切的文化交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际根研究员论述了包括三星堆遗址在内的南方青铜文化对南向的北方中原地区青铜文化的取舍、改造和创新过程，取了青铜铸造技术和器用制度，改造了尊、鬲的形制和纹饰，并创造了自身特有的器类，如三星堆的铜神树、人头像等。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王方研究员重点从陶器、铜器和玉器等方面论证了来自北方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对早期蜀文化的重要影响。

其二，与东方的文化交流。三星堆遗址位于长江流域的上游，由于长江的勾连，不可避免地与



中、下游地区的同时期文化发生文化交流，以往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也多次证实了这一点。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郑万泉馆员介绍了宣汉罗家坝遗址近年来的收获，认为其新石器时代遗存对包括三星堆一期遗存在内的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具有较大影响。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王方研究员则从玉石器、城墙筑造技术等方面论证了长江中下游的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给三星堆遗址带来的文化影响。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盛伟馆员认为从陶器特征可知芷江四方园遗址与十二桥文化可能存在文化交流。倒塘湾出土的铜鸟形器与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铜鸟较为相似，年代或较接近。

其三，与南方的文化交流。三星堆遗址被视为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与南方的文化交流自在少数，^[15]其文化因素在越南也有大量发现。越南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 Nguyen Gia Doi 教授就认为越南北部冯原文化遗址中所见的有领玉镯、牙璋等均与三星堆遗址有较为密切的关联。

其四，与西方的文化交流。三星堆遗址与西方的文化交流主要体现在一期遗存的文化来源方面，以往学者多将三星堆一期遗存及与之相似的宝墩文化遗存的文化来源追溯至甘肃马家窑文化，经营盘山、姜维城等遗址沿着岷江河谷进入成都平原，^[16]但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刘章泽副研究员则有不同看法。他认为营盘山、姜维城遗址的文化因素系翻越九顶山直接进入什邡，并发展为三星堆一期遗存的直接前身桂圆桥遗址及其所代表的桂圆桥文化，并不是沿着岷江河谷进入成都平原。英国牛津大学 Anke Hein 教授也对营盘山、姜维城等遗址所在的川西山地相当于三星堆、金沙时期的文化遗存进行了细致梳理。

其五，其他地区文化交流。文化交流在任何时候的任何地方都在进行着，了解其他地区的文化交流也可启示三星堆遗址相关方面的研究。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方辉教授从甲骨卜辞记载入手，以铜山丘湾祭祀遗址为例，论证东夷对犬牲的偏重，且用数多为偶数，并指出铜山丘湾虽然文化面貌为商式，但族属未必为商人，从祭祀用牲角度看为东夷人的可能性更大，最终指出根据

陶器判断考古学文化族属的合理性值得反思。郑州大学张莉副教授结合景观考古理论，全面梳理公元前 3000 年至公元前 2000 年相关考古材料，探讨甘青地区不同区域在参与文化交流中存在的时间和缘由差别，并尝试从社会机制角度入手分析史前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发展。两位学者的发言指出了文化交流研究的两个注意方面：（1）在讨论文化交流的时候，不应仅仅关注器物 and 遗迹，更应关注器物组合、葬俗等所反映的文化因素，后者较之于前者在判断文化遗存的性质、族属等方面更具有决定性；（2）在探讨一个遗址与多个地区的文化交流时，需要关注它们之间存在的差异及内在原因。

还应看到的是，无论以前的研究，还是本次会议所呈现的学术报告，在探讨三星堆遗址与其他各地区文化交流的时候，定性研究较多，而定量描述基本没有，难以直观解答三星堆遗址各个时期本地文化因素和外来文化因素所占比例及其变动情况，这也许是今后这方面研究需要着力的方面。

六 新视角和新方法

为了更好地认识三星堆遗址，将其置于同时期世界文明之中进行考察很有必要，经过多数国外学者的发言，本次会议基本实现了这一目标，而且还有意外之喜：一方面他们带来了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美国哈佛大学 Rowan Flad（付罗文）教授从技术角度探讨三星堆遗址的都市化，美国密歇根大学 Geoff Emberling 教授同样着眼于探索公元前 2000 年前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都市经济的转变，美国纽约大学 Roderick Cambell（江雨德）教授则通过殷墟和河南荥阳关帝庙遗址出土骨器的对比讨论晚商时期的经济模式。都市化、都市经济、经济贸易等都是国内考古研究较为薄弱的方面，上述三位学者的研究为三星堆遗址在这些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另一方面也给相关研究带来了新的启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 Willeke Wendrich（文维力）教授揭示了古埃及文明中的“再”现象，例如“再现”，所举例子即是相似的雕刻在各个

时期均有出现,类似的现象在国内的研究中,或被作为晚期混入早期遗物排除在研究之外,或被视为“返祖”现象,如今看来也许需要谨慎对待。阿根廷拉普拉塔大学 Irina Podgorny 教授指出 19 世纪晚期人们将早期青铜工具作为医疗用具的现象,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幸晓峰研究员也认为三星堆遗址所出列石璧应该是乐器或定律之器。可见,不应将出土遗物的用途约定俗成,或许它们还有其他的用途。

七 结语

两天的学术会议转瞬即逝,会场里不断涌现、激烈碰撞的新思路、新方法和新结论仅用本文寥寥数语难以全面囊括,不过它们对于三星堆遗址今后的考古工作和研究所产生的全方位影响则是毋庸置疑的,这实属三星堆考古之幸。

正如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高大伦教授在本次会议上所说的那样,三星堆遗址是全国唯一一个在同一地点经历了文明的孕育、出现、发展、辉煌、衰落、消亡全过程的遗址,其前后延续长达 2000 余年不间断且一直作为西南地区古蜀文明的中心,同样也是世所罕见。有理由相信,站在无数先贤的肩上,在众多前辈同仁的扶持下,今后三星堆遗址在上述各方面的工作和研究一定会取得更大的突破,也许震惊中国、震惊世界的大发现正在路上!

附记:本文涉及各位学者在会议上所作学术报告的内容均根据发言记录、论文摘要及演示文档整理而成,未经作者本人审定,可能存在错误或偏差,请参考作者相关论文。

注释:

- [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
- [2] 有关此次会议的详细情况,可参考中国考古网报道 <http://www.kaogu.cn/cn/xueshudongtai/xueshudongtai/xueshuhuiyi/2016/0722/54732.html>
- [3] 孙华:《试论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分期》,四川大学博物馆、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编:《南方民族考古》第5

辑,第10~24页,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

- [4] a.陈显丹:《广汉三星堆遗址发掘概况、初步分期——兼论“早蜀文化”特征及其发展》,四川大学博物馆等编:《南方民族考古》第2辑,第213~231页,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b.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
- [5] a.江章华等:《成都平原的早期古城址群——宝墩文化初论》,《中华文化论坛》1997年第4期;b.陈显丹、刘家胜:《论三星堆文化与宝墩文化之关系》,《四川文物》2002年第4期。
- [6] a.同[3];b.施劲松:《十二桥遗址与十二桥文化》,《考古》2015年第2期。
- [7] 许永杰:《聚落考古在中国——历程·现状·问题》,《华夏考古》2009年第4期。
- [8] 其中部分材料可参考雷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2012~2013年考古新收获》,国家文物局编:《中国重要考古发现2013》,文物出版社,2014年。
- [9]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工作站、广汉市文物管理所:《三星堆遗址真武仓包包祭祀坑调查简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四川考古报告集》,第78~90页,文物出版社,1998年。
- [10]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遗址工作站:《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仁胜村土坑墓》,《考古》2004年第10期。
- [11] 陈德安、杨剑:《三星堆遗址商代城址的调查与认识》,王震中等编:《夏商周方国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39~156页,科学出版社,2015年。
- [12]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鸭子河流域商周时期遗址2011~2013年调查简报》,《四川文物》2014年第5期。
- [13]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四川什邡市箭台村遗址、区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16年第2期。
- [14] 邓聪、王方:《二里头牙璋(VM3:4)在南中国的波及——中国早期国家政治制度起源和扩散》,《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5年第5期。
- [15] 段渝、刘弘:《论三星堆与南方丝绸之路青铜文化的关系》,《学术探索》2011年第4期。
- [16] a.黄昊德、赵宾福:《宝墩文化的发现及其来源考察》,《中华文化论坛》2004年第2期;b.江章华:《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遗存新发现的几点思考》,《四川文物》2004年第3期。